

當代批判文庫⑤ 楊青矗 策劃



台灣問題

蕭新煌 著



臺 灣 問 題

蕭 新 煌 著

敦理出版社印行

問題感

——自序

數週前，在一次飯局裏，席間一位在執政黨裏擔任重要職位的客人喝了幾杯酒之後，朝着我說：「爲什麼讀了你寫的文章之後，我就感覺到臺灣好像有很多嚴重的問題……」，他接着笑着對坐在我旁邊的陳教授說：「但是看陳教授的文章，却又覺得臺灣還是很有希望，很樂觀……」。我一邊敬了他一杯紹興酒，一邊向他說，「陳教授跟我是在分工，就請你自己選擇、判斷吧！」這位客人朋友也一飲而乾杯中的酒，笑的回答：「我剛剛說的是玩笑……」。這段短短的對話就此結束，話題馬上轉到在座其他美國教授有興趣的臺灣民主化前途問題……。

在同來的路上，我回想到剛剛那一幕，我覺得這位執政黨朋友的觀察很有意思，也算是中肯。事實上，類似像他的這樣評語，我也曾不只一次的聽過，我更不覺得他只是開玩笑的說說而已。幾年來，我一再有機會思考做爲臺灣的社會學者到底該如何自我定位和角色認同的問題。我也曾想過是不是可以調整一下，不要老是「提出問題」，看看能不能也多「解答問題」，讓自己，也讓別人輕鬆一點，樂觀一點。想歸想，做起來却不容易，過去那麼多年的思考訓練，所承襲的

學術以及自己的成長背景和性格，似乎有着很強的支配力量，在引導着我從事社會學研究的方向和方式。想改變，反而變成另一種負擔，而一點也不輕鬆。

事實上，這也牽涉到兩種社會學的傳統，一是批判的傳統，一是應用的傳統。「批判」強調的是「問問題」，而且更重視要「問對問題」；「應用」強調的是「答問題」，而且重視的是「回答要有用」。更淺顯的說，批判傳統講究掌握「問問題」的主動權和根本性；而應用傳統則往往把發問題的「權力」交給別人，通常是政府的行政單位，而專心於「解題」的專業化和實用性。當然，這兩個傳統不應該用好壞來評高低，也很難以孰是孰非來論斷。不論那一個傳統，都得建立在第三種傳統的基礎上，亦即理論的傳統。這個理論的傳統也可說是最古老的一種，它執着的是「求是」精神，對社會現象做徹底的了解和解釋。因此，照這麼說來，不管走的路線是批判或是應用，都應該秉持「求是」的原則。至於「批判」是否就帶來不悅或悲觀；「應用」是否就會使人快悅或樂觀，那恐怕已涉及「第三者」（通常是政府）的主觀反應了。我們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照說是無法對這個後果負責任的。不過，應用社會學家由於受到雇傭關係的規範，可能就往往要對這種反應敏感一些，而且有時還得向「案主」（雇主）有較多的讓步和妥協。

對我而言，掌握社會學家發問問題的主控權是最為重要的事，我絕不願意輕易放棄做為社會學家「界定問題」的權力。所以，幾年來，即使我在回答由政府或大眾傳播媒介提出的「問題」時，我都會做「重新界定問題」的努力，為的是「求是」，為的是求做為社會學家特別需要的一

種「心安」，如果不能適合於所有的社會學家，至少是我這種社會學家所期待的。

換言之，在我過去幾年治社會學的經驗裏，支持我的便是這個念頭。尤其是處理現實的臺灣社會現象和問題時，我會特別注意「界定問題」的工夫，從而產生在我看來是有意義的「問題感」，然後再依照問題感的脈絡去剖析現象及問題的本質，並且做有內涵的批判。最近我將過去寫過有關臺灣社會問題的文章整理了一下，就發現這些文章多少凸顯了上面這個性格，它們凸顯了臺灣社會在面臨轉型所產生的困境，以及政策在回應作為上的無力。透過這些文章暴露的臺灣問題，包括有民怨的提高，生活品質的扭曲，犯罪問題的升高，農業與農民問題的惡化，勞工性格轉變與勞工政策的偏頗，大學生參與的瓶頸，各個階級政治性格的消長變化，以及選舉暴露的潛在社會問題癥結等等。在這些文章裏，用力最多的便是展現要「問對問題」的問題感。也因為如此，將結集成書的這些文章，其特性便是批判的風格遠大於「應用」的目的。也許那位朋友又會問，為什麼我先要找出那麼多問題，而不幫忙解決一個問題呢？我的回答是，就像補破網一樣，如果不先知道到底有多少破洞，洞的大小和彼此的關係位置，就想補其中的一個洞，而且急著要再下海捕魚，很可能反而會事倍功半，徒勞無功的。

這本訂名為「臺灣問題」的文集，分為五輯。第一輯以一般社會問題為討論對象，涉及民怨與公權力問題、生活品質、福利制度、犯罪、山地財政等日益嚴重的問題；第二輯以農業及農民問題為主旨，重點在於批判從過去到現在的農業政策；第三輯的文章探索勞工問題，包括勞工性

格轉變、工會角色與勞基法功能諸問題；第四輯的主題是大學生問題，從大學生的社會性格談到大學生的社會參與的問題，以及近年來學生運動所呈現的癥結等；第五輯的文章環繞在選舉問題上面，從「參與」的意識問題剖析起，談到選舉結果呈現的「變」與「不變」，以及選舉相關的若干社會問題。我希望這本書對於了解臺灣社會的問題面，可以提供一個拼圖的工具。

我要感謝敦理出版社楊青矗先生對本書出版的關切，沒有他的催促，這本書的出版恐怕不會這麼快。

蕭 新 煌

七六年九月十一日於臺北南港

臺灣問題

蕭新煌 著

問題感

——自序

一

一、社會問題

關切臺灣現在和未來的社會問題

一一

民怨、社會問題與公權力

一六

強化民間團體社會力

二一

人民福利與國家發展

二四

——兼談社會指標的意義

政府對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責任

三〇

國建會中的「社會學想像」

三四

審慎規劃社會福利制度

四六

臺塑控告省府開發工業區弊端

五〇

一連串大案破後的省思

五三

評拆遷古蹟城牆事件

五六

臺灣山地地方財政的困境與出路
即使真有吳鳳這個人

五九
六四

二、農民問題

珍惜鄉村的「根」

春天裏的秋天

六九
七三

——對鄉村社會學與農業政策的檢討

如何消除臺灣農業發展的主要障礙

八四

——有關「臺灣農業發展的歷史社會分析」研究答客問

從青梅談農業問題

九五

農業政策改革的芻議

九七

——讀農民團體立委候選人政見之後

評省府兩項農業政策構想

一〇〇

稻田轉作計畫所暴露的農業政策問題

一〇三

正視農會改選的諸多問題

一〇六

健全農田水利會應有的認識與作法

一〇九

正視水利會選舉的諸多問題

一一二

——有感於「檢肅小組」的成立

訪晏陽初先生談：苦力・農民、鄉村改造和知識份子
向農民學習

——給科學的一課

鄉村的憤怒

一一五
一二四
一三三

三、勞工問題

勞工的心理建設

體認勞工性格的轉變，落實勞動基準法

開拓勞動基準法第二年的坦途

社會變遷中勞工教育內容應有之蛻變

勞工、工會與知識份子：三角問題的結與解

勞委會任重道遠

一四三
一四六
一四九
一五二
一五七
一六五

四、大學生問題

從大學生的社會性格論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服務自己，還是服務社會？

——談大學生的社會服務與社會變遷

一七一
一八六

中產階級「單一問題」政治興起

——看中 大專師生選戶選舉的舉動

大學生社會參與新模式

大學生的「翹課」

(附錄) 他們能改變什麼

——五學者談學生運動

一九二

一九七

一九九

二〇一

五、選舉問題

蛻變中的臺灣社會結構與政治動向

「參與」和「不參與」

選舉所暴露的社會問題

選舉政治的「變」與「不變」

「拜託」和「銘謝賜票」之後

國事點滴四則

選舉與電腦

二二七

二三五

二三八

二四〇

二四二

二四四

二四八

一、社會問題

關切臺灣現在和未來的社會問題

我前後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六年春，依抽樣方法在全省做有關環境意識的問卷調查。一九八三年的樣本是一一四五；一九八六年的樣本則是五一八。除了環境方面的問題之外，問卷內容還涉及社會問題。由受訪者按個人的主觀認知，就所列出的各項臺灣社會問題評斷其嚴重程度。嚴重程度分爲四級（「很嚴重」，「嚴重」，「不嚴重」和「根本不嚴重」），外加一項「不知道」的回答。在一九八三年的調查裏，共列了十八項社會問題，一九八六年則將其中的兩項去掉，並合併另外兩項爲一項，因此列出十五項社會問題。這兩次調查除了想做現況的主觀評價分析之外，還特別想測度民衆認爲這些社會問題在今後五年內，是不是會愈來愈嚴重或是改進，抑或「不知道」。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民衆在兩次調查中如何「排名」臺灣當前的社會問題。以回答「很嚴重」和「嚴重」的比例加起來的和，做爲排名順序的依據，這兩次的當前臺灣社會問題排行榜，分別是：

一、一九八三年：①青少年犯罪（86.8%）；②社會治安（82.0%）；③人口過多（78.8%）。

④經濟犯罪(78.7%)；⑤經濟不景氣(77.9%)；⑥公害污染問題(70.1%)；⑦賄選(69.1%)；⑧色情(68.7%)；⑨失業(66.9%)；⑩倫理道德低落(65.9%)；⑪貪污(65.8%)；⑫升學(63.0%)；⑬農民所得偏低(61.8%)；⑭物價上漲(56.8%)；⑮消費者權益(42.1%)；⑯離婚(41.8%)；⑰貧窮(35.9%)；⑱老人(35.7%)。

二、一九八六年：①青少年犯罪(91.0%)；②公害污染(88.0%)；③社會治安(83.7%)；④人口過多(83.1%)；⑤失業及經濟不景氣(80.8%)；⑥經濟犯罪(80.0%)；⑦色情(76.7%)；⑧升學(71.4%)；⑨賄選(71.0%)；⑩貪污(65.4%)；⑪老人(55.9%)；⑫離婚(49.4%)；⑬消費者權益(48.2%)；⑭農民所得偏低(46.9%)；⑮物價上漲(39.7%)。

從上面這兩個社會問題「排名榜」，我們可以觀察出來幾點頗有意義的現象：

第一：不論是在一九八三年或是在一九八六年，受訪者都普遍有着頗高的「社會問題感」。他們對所列舉的社會問題不但都反映出甚為強烈的認識，也都紛紛表示他們的主觀評價，而且評價的取向是承認臺灣的確存在着不少的社會問題。以一九八三年來說，在所列的十八個社會問題當中，被70%民衆指認是「很嚴重」和「嚴重」的，是前面的六個問題，即①青少年犯罪，②社會治安，③人口過多，④經濟犯罪，⑤經濟不景氣，⑥公害污染等。到了一九八六年，超過70%判斷為嚴重臨界點的社會問題，就不只六項，而共達九項，它們分別是①青少年犯罪，②公害污染，③社會治安，④人口過多，⑤失業與不景氣，⑥經濟犯罪，⑦色情，⑧升學，⑨賄選。同

時，可以看得出來，一九八三年的前六項嚴重社會問題，也同時出現在一九八六年的前六名排名之中。這兩年排名上所呈現的這種嚴重程度「一致性」，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多少意味着這六項社會問題，在一般民衆心目中更有着高度嚴重性的共識感。其中「公害污染」從第六名躍升第二名，更反映了民衆對環境問題的嚴重關切。

第二：再看兩年的排名順序，在一九八三年，超過70%嚴重關切點的社會問題和一九八六年超過80%嚴重關切點的社會問題，都分別是那上述六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而這六項社會問題又都是與個人的「切身關係」特別接近的，也就是那些最容易讓民衆產生「受害感」的社會問題。換言之，民衆在指認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時，有其一定的邏輯，那就是依所謂「與個人利害的距離」遠近，來辨識「社會」問題嚴重性的輕重。這個發現也有公共政策的意涵在，我們當可推論，如果政府能夠多下功夫去解決民衆主觀評價中的那些「客觀」社會問題，其能獲得民衆共鳴的程度，也應該會更高些。

第三：比較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六年民衆的「問題感」，我們看得出來，有着相當一致性的「提昇」趨勢。認為「嚴重」和「很嚴重」的比例，除了農民所得和物價上漲兩項之外，在三年當中，都普遍提高。這雖不能馬上推斷這三年之間，大多數的社會問題都「客觀的」在惡化，但至少暴露民衆在這三年之中，他們的主觀「敏感度」增加了。而對這種民衆日漸增高的「社會問題感」，政府似應格外加以正視才對。

其次，讓我們來分析民衆對未來五年社會問題可能變化的認知情形。以回答「會」更嚴重的比例高低，來做排名的順序，這兩個未來嚴重社會問題的排名榜分別是：

一、一九八三年，①青少年（62.3%），②社會治安（59.4%），③人口過多（57.2%），④公害污染（50.8%），⑤經濟犯罪（49.3%），⑥色情（47.1%），⑦倫理道德低落（46.1%），⑧升學（45.6%），⑨賄選（41.8%），⑩失業（40.2%），⑪物價上漲（37.7%），⑫貪污（37.1%），⑬離婚（36.2%），⑭農民所得偏低（35.1%），⑮經濟不景氣（33.5%），⑯老人（31.5%），⑰消費者權益（21.7%），⑱貧窮（21.2%）。

二、一九八六年：①公害污染（70.3%），②青少年犯罪（68.9%），③社會治安（66.5%），④升學（63.5%），⑤人口過多（61.6%），⑥色情（59.2%），⑦經濟犯罪（58.3%），⑧賄選（56.5%），⑨失業及經濟不景氣（52.7%），⑩離婚（49.8%），⑪老人（49.1%），⑫貪污（46.8%），⑬農民所得偏低（36.7%），⑭消費者權益（33.3%），⑮物價上漲（31.9%）。

上面這個排名和比例，我們又可做如下的觀察：

第一，普遍說來，兩次調查的結果都顯示民衆對這些社會問題在未來五年的變化，並不表示樂觀，而且可以說呈現一種頗為悲觀的態度。他們似乎都認為臺灣現存的那些社會問題，在未來不但不會好轉，而且預期是將會惡化下去。在一九八六年這種悲觀傾向似乎更為明顯。

第二，在兩次調查中，被認為是現況最為嚴重的那幾個社會問題（以超過70%嚴重度為準），都一致的被認為在未來五年也將比其他問題更為惡化。在一九八三年被指認為最嚴重的六大社會

問題，也正是民衆認為五年後將會更嚴重的那六大問題（回答比例都超過50%）。同樣的，在一九八六年被評斷為最嚴重的九大社會問題，也是被認為將更惡化的那九大問題（回答比例亦在50%以上）。如此相當一致的持續性，實在值得政府加以密切注意。

第三，一如對現況嚴重性的主觀評價，民衆的直接受害感距離也左右着他們對未來社會問題預測的認知，愈是跟他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問題，愈被認為將來也將惡化。

第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民衆對未來「公害污染」嚴重性的敏感和關切。在一九八三年，公害污染排名現況嚴重的第六，被認為是將更嚴重問題中的第四名；到了一九八六年，不但現況嚴重程度躍升第二，緊隨在青少年犯罪之後，在「未來更嚴重」的排名上，更是高居第一名，竟然排名在「青少年犯罪」和「社會治安」之前。這非常明顯的告訴我們，「公害污染」此一在一九八〇年代已令人矚目的環境問題，更被民衆視為是臺灣在一九九〇年代最為嚴重的一項社會問題。另外一個有趣的趨勢，則是民衆對臺灣未來的經濟問題如「物價上漲」和「經濟不景氣」似乎抱持着比較樂觀的態度。此一現象也頗值得我們加以進一步的觀察。

從以上對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六年民衆對當前重要社會問題的認知以及對未來變化的預測之觀察和分析，可以得到這麼一個概括的印象，那就是臺灣的民衆確實是有着高度的社會問題共識，他們不但關切眼前的社會問題，更擔憂它們未來的惡化。面對這種民衆日益提昇的問題感，為政者能不更加警惕嗎？

——原載七十六年九月一日「臺北評論」創刊號